

碑刻

古人為追思先祖、紀志垂芳，素來有立碑之俗。舊時碑石之上的丹書墨跡，皆出自書法高手。尤其歷代皇室宗親、達官顯貴所立之碑，字字精工、筆筆考究，皆是流傳後世的書法佳作。昔蔡中郎書《熹平石經》，立太學門外，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，填塞街陌，足見碑刻一經名手，便成藝林至寶，天下翕然景從。

清代書學興盛，包世臣首推碑體書法，開啟碑學研習之風。及至康有為，更是極力推崇碑學，尊碑尚石，獨重碑刻氣韻。南海曾言：「碑學之興，乘帖學之壞。」又謂魏碑有「十美」，舉其要者，如魄力雄強、氣象渾穆、筆法跳越、點畫峻厚，蓋以石刻之剛健救帖札之柔媚也。實則碑學與帖學，皆是中華書法藝術的傳世瑰寶，各擅勝場、各有千秋，缺一不可。

碑刻絕非簡單的鑿石留字，更是一门沉澱千年的傳統手藝。古人刻碑，以所雕體質樸，於刀鑿雕琢間賦予筆墨金石風骨。歷經鑿刻打磨，碑體自帶蒼古拙的金石韻味，雖與最初的書丹原作略有出入，卻平添了筆墨之外、石韻獨有的滄桑肌理。我曾受邀為廣東新興龍山國恩禪寺書丹五方碑石，亦有幸親臨現場，觀摩刻碑匠人實操雕琢，窺見這門手藝的精妙與門道。

傳統手工刻碑，工具簡約卻極具匠心，核心以各式石匠鑿刀為主，一分、兩分寬窄的啟口刀各司其職，搭配鐵板、鋼鉸作為墊底輔具，再以手錘輕敲慢鑿，逐字打稿、細細剔底，工序繁複，全憑功力與耐心。

時至今日，刻碑工藝與時俱進，電動機械設備逐步取代傳統手工工具。日常作業多使用手持電動器具，其中直磨機搭配金剛石磨頭、雲石片、金剛石雕刻刀最為常用，適配精細刻字與小型碑石作業。這類工具動力充沛、調速靈活，能精準把控字形細節，大幅提升刻碑的精細度與效率。

刻碑優劣，全繫匠人手藝功底，功力深淺不同，成品氣韻便天差地別。我為國恩禪寺書丹的五方碑石，其中四方均由福建工坊雕琢完成後運抵寺院安置，其所用工藝與工具無從考究。唯有一方巨型石碑，是匠人於現場以電動工具雕琢而成。

對比兩種工藝成品，電動刻碑少了傳統刀鑿的厚重金石味，卻最大程度還原了我書丹時的筆墨原貌，字形、筆意、章法幾近原作，對此我甚是滿意。



筆者為國恩寺佛荔園書丹的碑。作者供圖

在希望的田野上

姚珏

6月29日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音樂會《人民至上》在北京隆重舉行。音樂會以《紅旗頌》開場，最後全場同唱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》，分5個樂章以時代音樂串聯起黨率領中國走向富強的民族復興之路。其中管弦樂與合唱《希望的田野》則是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等一首首經典歌曲，「映照改革開放以來神州大地日新月異的喜人變化，訴說中華兒女同心築夢的美好心聲」。

這首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是45年前、1981年最先錄製播出的，反映了當時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，農村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。音樂往往是最能反映時代變革、人心所向的。這首歌最先由詞作家陳曉光在安徽體驗生活後，僅用半天就寫出歌詞。他覺得改革開放的農村形勢正是觸發點，沒有農村的新希望，就不可能有這首作品。歌詞後來由著名作曲家施光南譜曲，他堅持作品展現民族精神和時代風格，把中國民歌、戲曲韻味和進行曲的節奏融合在一起，既體現時代精神，又洋溢泥土氣息，嗚嗚上口。這首作品現在來看，也非常有先鋒意識，這種貼近百姓生活、反映時代進步的作品，也體現了守文化之根、創時代之新的創作成功秘訣。

7月1日是香港特區回歸祖國29周年，我覺得香港回歸的歷史，也是黨領導中國走向富強的民族復興之路的重要部分。不論是《東方之珠》《獅子山下》等經典歌曲，都反映了時代聲音。每一年的這個日子，我都會懷著崇敬之心來到金紫荊廣場，參加莊嚴的升旗儀式，心中湧動的，永遠是最真摯、最純粹的中國人的自豪感。我是1997年來到香港生活的，可以說，我與回歸後的香港是同齡、同成長，共經歷二十九載。我親歷這座城市的繁榮躍升，也共同走過風雨歷練的歲月。見證過時代的起伏，更看見祖國始終是香港最堅實、最溫暖的後盾。

香港當前又處在一個歷史的重要機遇期，特區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，為未來五年規劃和經濟、社會發展指明方向，6月29日新一份施政報告也正式展開公眾諮詢。特首李家超最新發布的宣傳片《深耕細作 乘勢而上》中，用農業耕種的原理談及香港的任務，他說「翻土」就好像我們施政一樣，首先找出問題，再想出改革方法；「播種」等於我們找出方向，推出不同的政策；然後還有「栽培」和「收割」，總共4個過程，讓市民實實在在感受施政的好處。我覺得這個比喻和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都是從土地和農業，講到了時代的奮進、人民的期待。

香港這片土地贈予我們無數機遇，在文化強國建設的宏大藍圖中，香港更肩負特殊而重要的使命。我們應當扛起重任，創作更多兼具中國底蘊、時代精神、國際格局的優秀作品，「在這田野上奮鬥，為她幸福、為她增光。」

敢對劉備講葷段子？

鄧飛

到底什麼時候應該防止過猶不及，什麼時候應該矯枉必須過正？在三國時代，蜀漢曾經面臨大旱災，糧食不足了，當然要節節糧食，不能用糧食來釀酒了。蜀漢朝廷嚴令禁止，違者判刑。執法人員甚至在搜查平民家中的釀酒工具之後，打算把擁有釀酒工具的罪刑等同於釀酒，這就引起爭議了。

有天，大臣簡雍與劉備一起外出，看到一男一女同行，簡雍對劉備說：「這對男女有姦情！應當拿下！」劉備愕然：「你怎麼知道他們有姦情？」

簡雍回答：「兩人身上有姦情的『作案工具』啊！這和有釀酒工具與釀酒同罪的道理一樣！」劉備被逗得大笑，明白簡雍的道理了，就免去了持有釀酒工具等同釀酒的罪刑。

故事的道理，先說簡雍，一如《三國志》作者陳壽的評價：「滑稽」，這不是我們今天理解「滑稽」的意思，這是延續司馬遷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的定義。用今天的話來說，對上級給意見，不能「蠻幹」，要「巧幹」，既要點中要害，也要用對方聽得進去的方式來表達。這不是什麼過分要求，這是合乎人情、合乎人性。

但從劉備的角度，就很少有論及的。劉備是整個國家的最後負責人，所有的治亂興亡，都由他來最後承擔。當時蜀漢的立國目標，當然是北伐曹魏、興復漢室，因此要最大限度開發和集中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資源，以備戰時需要。況且蜀漢是三國之中疆域最小、人口最少的，北伐中原是以弱擊強，曹魏拖得起，蜀漢拖不得。

一場旱災帶來的糧食危機，遠不只影響民生，更影響北伐的戰爭物資之積累，拖慢北伐準備時間的進度。劉備對此當然心中有數，當然對此有非常深刻的政策焦慮。把持有釀酒工具等同釀酒的過猶不及做法，其實就是反映出他的這種焦慮感，並不完全因為執行人員的邀功。過猶不及是過火了，但如果老劉身邊的輔政顧問們沒能想到他這份根本的焦慮，沒能為消除這份根本焦慮提供有效的替代解決方案，而單純是反對過猶不及，其實也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。這也是平時常說的「反對和批評當然容易，提出解決方案才是最難」。

附上原文及出處：《三國志·蜀書·簡雍傳》
時天旱禁酒，釀者有刑。吏於人家索得釀具，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。雍與先主游觀，見一男女行道，謂先主曰：「彼人恣行淫，何以不縛？」先主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雍對曰：「彼有其具，與欲釀者同。」先主大笑，而原欲釀者。雍之滑稽，皆此類也。

阿倫終極篇

林奕兒

這些年見到譚詠麟（阿倫）幾乎都在球場上，他組織的明星足球隊如今很有規模，完全是職業球隊模樣。他們這幾年跑遍中國，哪裏邀請便到那裏踢，經常見到他之外，還有同行兄弟：黃日華、曾志偉、關禮傑、何家勁、羅家英、苗僑偉、張兆輝、李子雄、洪天明、張國強、吳岱融及新一代的黃庭鋒、孔德賢及多位退役球員等。由於他們組織更為成熟，我也因此認識了他們的內地經理人，是一位很友善、很有禮的人，有什麼需要他都會盡力幫手。我常常都見到他在微信發放訊息，從而可以了解到球隊的近況。

此時說到明星足球隊，其實前幾天看到黎芷珊訪問阿倫，當然不只是明星訪談，是因為阿倫將於9月在紅館舉行10場《譚詠麟與您「刻骨銘心」世界巡迴演唱會——終極篇》。他上一次在香港舉行個唱是2015年的《銀河歲月40載》，距今又已經是11年了。而大家還是很喜歡看到他電視上出現，聽他講由出道至今的每一個10年。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開始，我見證了他幾十年的努力和成就，那年頭他與4位溫拿樂隊的拍檔鍾鎮濤、彭健新、陳友及葉智強開始在電視節目中亮相，每星期六在麗的電視做青年節目，我便每個星期六負責採訪，跟他們也混得挺熟。到了八十年代他們各自發展，阿倫開始拍電影、拍電視，成為獨立歌手。那年代是他音樂生涯的巔峰期，拿獎拿到手軟，連續14年幾乎沒有放假，只有3次假期，其中最長放了8天，然後是6天、3天。他說只要把工作當成興趣便一點也不辛苦，他愛工作且有鋼鐵體魄，由初中開始每天只睡4小時，至今沒變。

他在我心目中的確是「幸運倫」，不過還是遇到過很不「幸運」的事。1994年的大球場演唱會，他們準備了價值2,000萬的器材，卻沒法如常運作，只開到0.5度音量，觀眾大部分只看到台上的他在動，卻聽不到他唱什麼，至今他還覺得很對不住觀眾。時隔32年，我們依然為他抱不平，也不知道當年什麼人批給他開演唱會，卻又被什麼人投訴和阻撓，至今仍給大家留下難以理解的遺憾。



● 咱們相識了半世紀。作者供圖

譚耀文的光環背後

湯禎兆

看過《我們不是什麼》的觀眾，大多同意片中耀耀的人物，當屬譚耀文飾演的退休鑑證專家龍Sir。譚耀文的演技潛力，早在《野獸刑警》中已表露無遺。但龍Sir這個角色，堪稱他從影以來最光芒四射的演出。這固然歸功於扎实的劇本，龍Sir本身也是兩個年輕人陳仔與Ike人生交差點的前奏，電影亦清楚揭示其前身：在同志身份的陰影籠罩下，他曾打算製造炸彈，與同事同歸於盡。

然而，若僅停留在劇情層面解讀，便忽略了這個角色的深層意涵。我認為，龍Sir之所以神采飛揚，關鍵在於他本身就是導演邱禮濤的自我投射。

將邱禮濤的創作軌跡並置對照，脈絡便清晰可見。想想他那些鋒芒畢露的偏鋒作品：《的士判官》《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》《伊波拉病毒》《失眠》……每一部問世都像一枚擲向社會的炸彈，恰恰等同於龍Sir構想過的炸彈，也等同於兩個年輕人手上那枚用硝酸鉍製成的土製炸彈。這些電影的完成與上映，每一次都在輿論場中引爆震撼，狠狠挑戰社會大眾的道德底線。

但與此同時，邱禮濤始終保留著一個社會認可的導演身份、一個專業冷靜的外在形象——這就恰如譚耀文所飾演的龍Sir。他清楚知道自己功能所在：以專業能力讓社會大眾理解邊緣人物的痛苦，並將被掩蓋的真相公諸於世，喚起旁觀者的同理心。龍Sir既是拆彈的人，也是曾經企圖引爆炸彈的人。他站在秩序與毀滅的交界線上，恰如邱禮濤30年來一直站在類型規範與社會批判的夾縫中，為那些不被看見的人點亮微光。

正因如此，譚耀文的表演之所以帶著難以言喻的光環，不僅在於他演活了一個飽經滄桑的退休督察，更在於他承載了導演自身的創作倫理。這份重疊，才是成就龍Sir這個角色的核心基石。

田間勞動記

在我的書架上，擺放着一頂精緻的遮陽帽，那是我的老物件，每當看到它，便勾起我對年少時在田間勞動的記憶。

我父親沒有土地，在中學教書，母親種着一畝多地，還侍弄着小菜園。種莊稼種青菜母親是高手，從幼苗到採收，都浸透了母親的汗水。地瓜、玉米、花生都像乖娃娃，在母親的精心呵護下茁壯成長，直到顆粒歸倉，母親才安心休息。每逢假期，父母便帶我去田裏勞作，那時的我歡欣雀躍，並不懂種田的辛苦，確切地說，是田野的自然風光吸引了我。那裏有一望無際的大棋盤似的田疇，莊稼苗像綠地氈一般鋪展着，開滿各色花的青草布滿路邊溝沿。

在田裏勞動時，父親鋤草，我便跟在他後面撿拾青草。父親教書好，做農活也在行。他用木桿將地瓜秧翻到地壟一側，他壟的另一側露出鮮嫩的草兒，密密麻麻地鋪滿壟，仔細一瞧，草葉上還掛着晶瑩剔透的露珠，在陽光的照射下，像一粒粒小珍珠。父親揮舞着鋤頭，用力一拉，那些草兒便紛紛倒下，我飛快地撿拾青草，拾滿籃子，便將青草倒在地壟。

太陽火辣辣地照着大地，我們忙碌着，汗水濕透了衣襟，鞋子沾滿了泥巴。偶爾有蚂蚱在地瓜秧上蹦來跳去，它們穿着綠外衣，啃食着地瓜葉。父親用手輕輕一摳，便捉住了蚂蚱，他將蚂蚱用草莖纏住，別在遮陽帽上。歇晌時，父親帶我去捉豆蟲，豆蟲有拮把長，碧綠色，附着在豆苗的結稈上。蟲兒胖乎乎、軟綿綿，我用手輕輕一戳，蟲兒打個激靈，掉在地上，像擲麻花一樣在地上打滾。

午餐時間到了，母親挑着一擔飯菜悠悠地走來，扁擔壓在她瘦弱的肩頭，吱吱嘎嘎地響。母親小心翼翼地將扁擔鉤子上的籃子放下來，籃子裏裝着一保溫桶稀粥、一壺開水、一包煎餅和一飯盒菜。天當房，地當桌，我們席地而坐，津津有味地吃午餐。父親一邊吃飯，一邊教我說俄語，發音嘖嘖咕嚕，還教我背《鋤禾》，講解詩的含義，強調不可浪費糧食，要珍惜每一粒米。那時我才幾歲，對詩似懂非懂，但體驗到了每一粒米都是流汗辛苦勞作得來。

待到收工時，火辣辣的太陽早已把青草曬乾了。父親將乾草裝進籃子裏，壓實，掛在鋤頭上，將鋤頭扛在肩頭，我們拖着一身的疲憊回家。母親將遮陽帽上的蚂蚱捉下來，放在爐膛上的鐵絲網罩上燒烤，蚂蚱被烤得焦黃酥脆，吃到嘴裏香噴噴的。父親把豆蟲洗淨，用油將豆蟲炸了，一盤子油炸豆蟲便是一家人最好的牙祭。母親將豆蟲分給左鄰右舍吃，她說有捨才有得，多年後，我才明白捨即得的大道理。

在田地裏勞動時，我的皮膚被曬黑了。在那個秋收的季節裏，母親將高粱秸稈的頂部截下來，用小刀劃拉成細糜子，再刮淨糜子裏面的瓢，父親給我編織了一頂遮陽帽。有了遮陽帽，我再去田裏勞作時，就不會太曬了。

時光飛逝，小學畢業後，我去外地讀書，隨後工作，遠離了田間的勞作。我將那頂遮陽帽一直珍藏着，成了永遠的勞動紀念品。離開家鄉的土地後，我再也吃不到自家土地裏出產的糧食和蔬菜了，可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那些土特產，鮮嫩的苞米，香甜的紅薯，水靈靈的瓜果。我多想擁有一片土地，種點糧食和青菜吃啊。我在家屬院裏整理出一片菜園子，鬆土、起壟、施肥、澆水，再買些蔬菜種子撒下，覆蓋上一層薄薄的土，每天灑些水，保持土壤濕潤，種子很快便發芽了。土生金芽芽，天道亦酬勤，小白菜、小油菜、青辣椒等長勢旺盛，甚是喜人。

每當侍弄院子裏的青菜時，我便戴上那頂遮陽帽，給小菜澆水、捉蟲、剔苗，再次品味到了勞動的辛苦。看着那些碧綠鮮嫩的青菜，水靈靈的模樣兒，我的內心卻充滿了歡喜。品嚐一下自己種的小青菜，味道確實比從超市裏買來的脆嫩爽口。小菜園子散發着泥土的芳香，我坐在菜園子旁邊，或讀書、或為文，安靜閒適，感覺給生活增添了些許樂趣。

從泥土裏創食的日子早已遠去，在如今的美好生活裏，總也抹不掉年少時在田間地頭辛苦勞動的記憶，那些過往的勞作飽含着艱辛苦澀，卻也有幸福綿長的滋味。

餐廳有狗

從這個月9日開始，有狗出入會成為香港800多間餐廳的常態。對於愛狗人而言，是香港文明格格的標誌性事件。外出就餐是一家人最普通不過的相處方式，狗終於可以名正言順享受這一待遇。

隨著老齡化和少子化趨勢日漸加劇，香港養寵物的人群龐大，寵物友好型社會，也需要從粗線條的管理，漸漸進入精細化生活化階段。這個問題不能迴避，也不容迴避。香港目前已有176個寵物共享公園，遍及港九新界，基本上都設置有寵物糞便的收集箱和洗手設備，方便遊人和寵物使用。我常年戶外跑步，就個人多年所見，戶外放狗的狗主，幾乎都有隨時攜帶清理寵物糞便、清洗路面的設備。腳之所行，目之所及，路上遇到遺有寵物糞便的次數，微乎其微。香港狗主們的整體素質可見一斑。

政府因應社會結構變化，調整公共空間的寵物准入制度，實為順應民意之舉。獲發牌的寵物友好餐廳，須在門口當眼處張貼指定標識，並嚴格恪守「三禁止」底線：禁止狗隻上餐桌、禁止使用人類可重用餐具、禁止在店內為狗烹煮食物。火鍋店與烤肉店因衛生風險較高，被排除在牌照申請範圍之外。這些看似嚴苛的規定，實則是對公共衛生與他人權益的尊重。

香港現有約22.1萬隻狗，貓狗合計逾40萬隻，衍生出的寵物經濟規模可觀。在自由市場邏輯下，商家迎合消費者需求本無可厚非，但寵物友好絕不等於毫無邊界。全港18,000間餐廳中，目前有833間獲發寵物友好牌照，佔比不足5%，這本應為非養寵人群提供充足的選擇空間。然而現實中，部分不愛狗甚至怕狗的市民，仍難免在公共空間遭遇心理不適。比如，對公共衛生的隱憂首當其衝。毛髮過敏者、帶孩童的家長，不免會對狗隻掉毛、異味或排泄物污染就環境的憂慮。即便餐廳嚴格分區、加強清潔，一旦個別狗主疏於管束，便可能引發鄰座糾紛。安全風險亦不容忽視，烈性狗雖被禁止入內，體型小的狗受驚吠叫，撲人的突發行為，還是難以百分百預判。

除此之外，倘若部分狗主自律不足，不牽繩、縱容寵物吵鬧，不僅破壞制度初衷，也容易激化養寵與非養寵群體的對立。私人情感總歸不能凌駕於公共規則之上，在家與寵物同吃同眠是私域權利，但在公共餐廳，狗仍然被視為可能帶來衛生與安全隱患的動物，要嚴格遵守公共空間規則。

放眼內地，寵物狗數量保守估計已突破1億隻，寵物經濟崛起帶動的市場規模，仍在持續擴大，但寵物餐廳進食引發爭議事件頻頻鬧上社交媒體，進而激化不同人群對待寵物的矛盾。香港寵物友好餐廳的管理探索，恰可為內地提供先行借鑒。

寵物友好的社會包容，是建立在規則之上的相互尊重。養寵人對待寵物的愛應有清晰的界限，非養寵人的包容也需以安全和衛生作為前提。當每個社會中人人都能擺正個人偏好與公共規則的關係，人寵共融，才會真的其樂融融。



● 寵物與人 作者提供AI製圖